

杜威 在华学谱

顾红亮◎编著

1920

师范大学出版社

An academic chronicle
of John Dewey in China

杜威

在华学谱

顾红亮◎编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在华学谱/顾红亮编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杜威研究在中国)

ISBN 978 - 7 - 5675 - 9028 - 1

I. ①杜… II. ①顾… III. ①杜威(Dewey, John 1859 - 1952)—思想评论

IV. ①B712.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4913 号

杜威研究在中国

杜威在华学谱

编 著 顾红亮

责任编辑 朱华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昆山市亨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1.7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9028 - 1/K · 534

定 价 6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目 录

1	4	20	154
○	○	○	○
丛书序	自序	1919年	1920年

282



1921年

352



附录：杜威系列演讲时间表

358



参考文献

366



后记



19 世纪末,传统西方哲学受到严重挑战,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努力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在罗蒂的眼里,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无疑是这一努力的杰出代表。而后两位哲学家相比,杜威的优点更为突出。如果说实践、社会、历史是新哲学的核心关怀的话,那么它们在杜威哲学那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不仅如此,杜威哲学还可导出科学和民主的观念。要走出西方哲学的困境,杜威可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思想资源。

但罗蒂或许遗忘了,早在杜威之前约半个世纪,受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便已经开启了新哲学的路径。在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型的过程中,马克思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

他是杜威的先驱和同道。毋庸讳言,在马克思和杜威之间存在着分歧,其中一些甚至相当尖锐。但尽管如此,我们不应模糊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分歧与他们共同的哲学目标相比,是次要的、枝节性的。当代另一位美国著名哲学家韦斯特曾经有言:“杜威就是美国的黑格尔和马克思!”^①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在诸多西方哲学流派中,杜威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最具亲和性。杜威曾被西方学者称作“孔子第二”,怀特海明确说道:“如果你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如果你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②杜威伦理学的哲学立场、知行合一的哲学方法、非二元论的哲学思维方式等等,无不显示出与传统中国哲学的意趣相投。愈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愈为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出路,杜威哲学愈值得关注。

与众多西方哲学家不同,杜威不是书斋型学者。他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现实,他的哲学影响波及众多领域,直接参与了对美国思想文化的塑造:无论是作为哲学分支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知识论,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艺术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批评等等,无不渗透了杜威的影响。可以说,了解杜威是打开美国之门、了解美国社会以及思想文化最好的钥匙。

一百年前,杜威的来访曾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自那以后,杜威在中国命运坎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终于逐渐获得它应有的学术尊严。几乎是同时或稍早一些时候,杜

① 韦斯特:《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董山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

② 《当代美国学者看杜威》,王成兵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

威在西方学术界也重新受到青睐；随着美国人对杜威研究兴趣的复活，欧洲大陆的学术界也开始将“实用主义”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人们终于看到，杜威哲学不但没有成为历史，相反，它仿佛等在前方，为当代许多重要的哲学争论提供独特的启示。

有关杜威哲学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杜威研究在中国”系列的问世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国学者的杜威研究工作进升到了全面展开的阶段。继《杜威全集》(39卷)、《杜威选集》(6卷)以及《杜威著作精选系列》(12种)的翻译、出版之后，关于杜威哲学的全面研究已经水到渠成。

由于诸多原因，在我国学术界，杜威哲学研究存在着巨大的断层。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中，杜威完全消失了。只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这一研究才逐渐陆陆续续地展开，但长期积淀下来的偏见如此之深，要彻底改变一些人对杜威哲学的偏见，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由“复旦大学杜威中心”组织编写的“杜威研究在中国”系列只是开了个头，我们期待着学术界的跟进，相信更多的成果将会不断涌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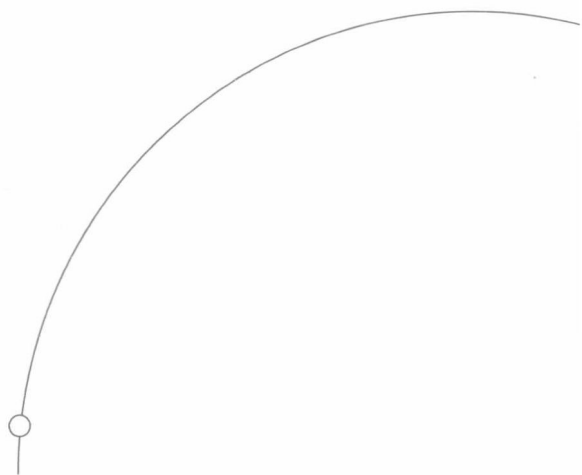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杜威中心”一直致力于对杜威乃至整个美国哲学的翻译和研究，致力于为这一研究提供优质的学术平台。我们热切期待各方朋友的加入，共同努力，将杜威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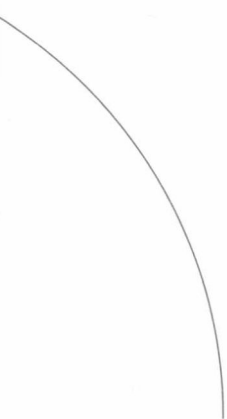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出版杜威翻译及研究作品的重镇，对于杜威的翻译研究始终如一地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朱华华编辑为这套丛书付出了非常高效而艰苦的努力，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复旦大学杜威中心：刘放桐 陈亚军

2019年4月30日

目序





一

大约二十五年前,我选择“杜威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认识到档案文献对于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开始有意识注意搜集杜威在华学术演讲和游历参观的资料,复印或摘抄《申报》、《晨报》等民国报刊中有关杜威行踪的报道和演讲稿。1999年,博士论文完成之际,副产品“杜威在华讲学大事记”形成初稿。十多年过去了,这份初稿一直保存在电脑中。2015年,《实用主义的误读》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杜威在华讲学大事记”被收为该书的附录。

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以《实用主义的误读》为题在200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

次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再版)。该书的侧重点在于讨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胡适、陶行知等思想家的关系。随着对实用主义与中国之间关系的研究的深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现代新儒家之间的关系渐渐成为我的研究重点。《实用主义的儒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便是这个研究的结晶。

无论是对杜威的实用主义与中国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是对杜威哲学衍化的研究,都需要了解杜威在中国访问的历史事实与经过,需要掌握杜威在华讲学的文献。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扎实的、翔实的档案整理。如果能以年谱的形式把杜威在华活动记录下来,形成一份学术性的断代年谱,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早年编撰的“杜威在华讲学大事记”,是编著杜威在华年谱的一个起点。我依靠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帮助,利用到美国波士顿、台北等地访学的机会,查找报刊文献,阅读多种全集、日记集、书信集,不断扩充“杜威在华讲学大事记”。渐渐地,编年的文献越聚越多,信息越补越全,从二三十页变成二百多页,一本年谱初具雏形。我把这份断代学术性年谱命名为《杜威在华学谱》。

如果说《实用主义的误读》、《实用主义的儒化》侧重于理论阐述,那么,《杜威在华学谱》则侧重于文献综合或文献“诠释”,三者构成我的实用主义研究的“三部曲”。对于实用主义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杜威在华学谱》可提供较丰富的档案文献,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

从讲故事的角度看,本书将合理可靠“诠释”杜威访华的场景与面貌。学术界已经出版多部描述杜威在中国访问及其思想影响的

著作,如元青出版《杜威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宝贵编著《杜威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寿堪和王成兵合作撰写《实用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书后改名为《实用主义的中国之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等等。

在英语世界中,Barry Keenan 出版过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Jessica Ching-Sze Wang 出版她的博士论文 *John Dewey in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多维关系。在这些研究的背后,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工作,一直未受重视。黎洁华编写过《杜威在华活动年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2、3期),颇具参考意义。三十多年过去了,迄今未见更详尽的年谱或年表出现,不免是一种缺憾。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希望本书有助于促进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创新。用东方人的治史方法,编撰西方思想家的年谱,已经有一些成果,朱政惠编著的《史华慈学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就是一个例子。用日志、年谱等传统治史的方法研究杜威在中国的讲学历程,挖掘更多杜威在华访问的“史实”和“档案”,发挥传统史学方法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积极功能,是一项值得探索的学术任务。它把哲学史的实证研究和哲学思辨结合起来,希冀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革新,给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风气。

整理“杜威在中国”的档案资料,需要考虑时间范围和文献范围的设定。

第一,时间范围。

杜威抵达上海的时间是1919年4月30日,离开北京准备返国的时间是1921年7月11日,离开青岛乘船赴日本的时间是1921年8月2日,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时间是1921年9月11日。把杜威在华年谱文献所涉的时间范围设定在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的7月11日或8月2日之间,无可非议,自然妥帖。黎洁华编著的《杜威在华活动年表》采取的时间段是从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11日。

本书愿意把时间范围稍稍放宽,但又不能放得太宽。因此,确定的时间段是从1919年1月至1921年12月,整整三年。这样可以把杜威访华前后的背景和离开中国后的反应容纳进来,把“前因后果”呈现出来,更全面地展示杜威访华的丰硕成果和广泛的影响力。

“前因”包括杜威的日本之行。杜威开启东方之行,包括对日本和中国的访问。杜威应允到中国访问,与他到日本的讲学直接关联。胡适写信邀请杜威访华。郭秉文和陶履

恭在东京拜访杜威，发出讲学邀请。杜威是在访问日本期间做出到中国讲学的决定的。杜威的日本之行是中国之行的前奏。因此，本书的时间段延伸到1919年1月，简略地汇集了杜威夫妇在日本访问参观的经历。

“后果”包括杜威途经日本和到达美国后的活动及中外学术界的反响，包括杜威发表的论述中国现象的文章。胡适1921年10月在北京大学开设“杜威著作选读”，带领学生阅读《思维术》。选课人数众多。这些事实都显现出杜威在华访学的成效。把本书的时间段延伸到1921年底，能略微展示杜威访华的后续效应。

本书按年、月、日顺序纪事，编排档案文献和学术活动。力图记录杜威每天的日程安排，尽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杜威的学术演讲为例：首先，按杜威演讲的日子来编排；如果不能确定演讲日期，就按演讲稿在报纸刊登的日期来编排。

第二，文献范围。

本书收录的文献，类型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杜威在中国进行的学术演讲、参观等活动的记录或报道。很多演讲稿刊载在当时的报纸上，有的还被结集出版，如《杜威三大讲演》、《杜威五大讲演》等。当时的《晨报》、《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益世报》、《新青年》、《新教育》等报纸杂志都有关于杜威到各地演讲、参观的报道。

第二类，杜威发表的时政论文。杜威在中国访问期间，写下不少政论性的英文文章，讨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的学生运动、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发展等，寄给美国的《新共和》、《亚细亚》等杂志发表。《杜威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1—1991. 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并翻译出版)共收录有关中国问题的时政论文(包括回函、书评、报告等)约49篇,其中中期著作第11卷有9篇,中期著作第12卷有8篇,中期著作第13卷有24篇,中期著作第15卷有1篇;晚期著作第2卷有4篇,晚期著作第3卷有3篇。在1919—1921年间撰写或发表的中国问题文章,主要集中在杜威中期著作第11、12、13卷,共计约38篇,数量相当可观。

第三类,杜威夫妇的信函等,包括在日本和中国所写的家信。杜威夫妇刚到日本和中国时,给家里人写信,报告他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这些家信被杜威的女儿 Evelyn Dewey 编成书信集,以《日本和中国书简》(*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20)为题在纽约正式出版。在杜威夫妇的家信中,蕴藏着大量的年谱信息。

第四类,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或者批评杜威思想的文章,所作的与杜威思想有关的演讲等。陈独秀、胡适、陶行知、蒋梦麟、梁漱溟、冯友兰等都对杜威的思想发表过评论,或者引述过杜威的言论,或者吸收过杜威的观点。

第五类,中国学者写的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等。胡适、黄炎培、经亨颐、冯友兰、恽代英、杨昌济、吴虞等学者的日记,都记载有与杜威交往、听杜威演讲、阅读杜威著作的经历。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郭秉文等之间的通信,保存了不少杜威访华的资料。

根据当今标点习惯,本书对于无标点或用旧式标点的原文,酌情改动。

整理“杜威在中国”的文献,不仅有技术层面的考量,如时间范围和文献范围的划定,而且有主导原则的考量。这涉及三个问题:如何对待资料的“全”与“不全”?如何研究性地驾驭和使用资料?如何看待日常生活的资料?

第一,在搜集“杜威在中国”的档案文献方面,本书并不求“全”,而是求“有价值之全”,有利于掌握杜威在中国的学术性的日程安排线索。搜寻杜威在中国的档案文献的过程,是一个让文献“说话”的过程,让文献“敞开”的过程,让不同来源的文献考证校勘、相互交流、相互印证,澄清事实,更正不实记载。

例如,《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说1919年11月11日晚7时,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开同乐会,邀请杜威和各音乐家演说,并演奏中西音乐。实际上,当天晚上,杜威因病没有到场演讲。笔者从胡适的文章《在同乐会上的演说》中得到佐证。胡适写道:“今日本有杜威先生的演说,因为病了没有来。——刚才会长已经报告——我今日到会,一则代达杜威先生的歉意;一则贡献我个人的意见。”^①结合《北京大学日刊》的启事和

^① 胡适:《在同乐会上的演说》,《胡适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胡适的文章，确认杜威因病缺席同乐会。

又如，胡适把杜威抵达上海的时间记成1919年5月1日，杜威在演讲中也说自己到中国的时间是5月1日。胡适和杜威的说法影响了一些学者的看法，把5月1日确定为杜威抵达中国的时间。根据《申报》记载，杜威夫妇抵达上海的时间是1919年4月30日，不是5月1日。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人到码头迎接杜威夫妇，并送他们到沧州别墅居住。^①《申报》的报道证实杜威和胡适的记忆不准确。

第二，本书并不求“罗列”资料，而是求“诠释”事实。本书“诠释”的大多是关于杜威的学术行踪的事实，有出处，有评价，有对照。杜威的学术日程“安排”是笔者研究杜威在中国的课题成果。本书尽力体现研究的色彩，使之成为研究性的“学谱”。

例如，1920年1月2日，天津青年会邀请杜威在天津演讲“真伪个人主义”（或译为“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天津《益世报》的报道简要记录演讲的大意。胡适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复述杜威此次演讲的核心思想，在真的个人主义与假的个人主义之外，引出第三种类型的个人主义，即独善的个人主义，新村运动渗透着这种个人主义哲学。“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如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胡适批评独善的个人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在于把个人

^① 参见《杜威博士到沪》，《申报》1919年5月1日。